

国别与地区

萨义德思想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李 意

[摘要] 一直以来,巴勒斯坦民族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处境,建国的目标遥不可及。生长在西方的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在中东政治权力、文化身份被淹没的情境下,挺身而出并投身到巴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萨义德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认识充满矛盾,他在理论上明确反对民族主义,但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强烈真挚的中东情结和民族身份认同感注定了他的民族情感倾向。本文通过考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萨义德思想,挖掘萨义德思想中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呼唤民众起来斗争的内涵,以使更多热爱和平的人理解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

[关键词] 萨义德;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以关系;阿以冲突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9)06-0068-73

卡夫卡在 1921 年 10 月的日记里写道:“凡是活着的时候不能应付生活的人,就需要用一只手稍稍阻挡住他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他要用另一只手记住他在废墟中看到的东​​西,因为他能看到与别人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和更多的东​​西。”^[1]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是美国当代少数具有批判意识的著名知识分子,也是巴勒斯坦甚至中东在西方的主要代言人。每当巴勒斯坦或中东发生重大事件时,西方媒体和大众都希望知道他的看法,他俨然成为中东局势与政策的意见领袖,不愧为“巴勒斯坦之音”的称号。萨义德毕生的努力显示了人文学术、政治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他通过写作,不仅指出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人文知识话语介入其中的可能性,同时也指明了在历史与政治的双重道德面前,知识分子应当“向权力说真话”。在中东政治权力、文化身份被淹没的情境下,萨义德挺身而出,投身到民族解放的具体历史斗争之中。他的理论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又指导实践,堪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呼吁伊斯兰世界的内外部进行平等对话,对阿拉伯人生活的环境、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现实进行批判性考察,认为只有以和平对话的方

式才能缓解无休止的战争给阿拉伯和犹太这两大民族所带来的苦难。由于积极支持并投身于巴勒斯坦解放斗争,萨义德被许多西方人和犹太人视为暴力和恐怖主义的代言人。尽管如此,他仍积极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特立独行的勇气,言人之不能言、不敢言。本文通过考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萨义德思想,挖掘萨义德思想中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呼唤民众起来斗争的内涵,以使更多热爱和平的人理解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

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内涵

民族主义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由于人们通常以自身地区性的经验来定义民族主义,这使得表述并定义民族主义极为困难。本文以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的界定为参照:“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有助于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2] 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多样,基本可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类,理性的民族

* 本文属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年规划基金项目“中东政治语境中的萨义德思想研究”(2009114009)的前期成果。

主义对抵御外来入侵,捍卫民族尊严,促进民族进步,捍卫人类基本价值规范具有积极意义。如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中,民族主义从西欧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使民族主义成为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力量;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则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它盲目自大、因循守旧、仇视异族,甚至导致冲突或战争等负面结果。通常,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型的民族主义,如分离主义(Separatist)、排外主义(Xenophobia)、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以及军国主义(Militarism),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包含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此外,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后产生的一种以本民族利益为诉求的主义,民族主义具有浓烈的个人情感,渗透着群体无意识的社会意识。

20世纪中期持续至今的阿以冲突是中东历史上因民族主义而引起的重大事件。由于双方皆认为对方并非真正的民族,故无权建国,并因此冲突频发、战火不断。1967年“六五战争”对中东局势影响深远,其中之一就是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逐渐消解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在此之前,以纳赛尔为代表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宣扬的是通过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的方式解放巴勒斯坦并走上现代化道路。但战争的惨败使这一理论破产,在纳赛尔去世后,没有人能再度举起阿拉伯团结的大旗。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乘机作出解释——阿拉伯人的失败是因为背弃了纯洁的宗教道路。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在下层民众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纳赛尔时代曾遭受严厉打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再度崛起,并为哈马斯和“基地组织”提供了精神支持。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一方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哈马斯、真主党等“非国家行为体”取代了古典的阿拉伯民族政权,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主要因素。

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它具有特殊性,其民族的形成先于国家的形成,与大多数国家构建的过程不同,“民族的构建”与“国家的构建”不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巴勒斯坦人至今被学术界称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5]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谋求政治平等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产生的。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它起源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奥斯曼主义。^[4]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前,巴勒斯坦民族曾在1936—1939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

装起义,反对英国委任当局的“扶犹抑阿”政策。该起义被镇压后,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处于低潮。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土地被分成三个部分,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已不再是个整体,70多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约旦、叙利亚、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沦为难民。此后,纳赛尔和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思想风靡一时。正如原巴勒斯坦裔的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纳迪姆所指出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通过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来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心愿。巴勒斯坦人不否认自己的阿拉伯属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力量,因而淡化了自己的民族特性。”^[5]

然而,1967年“六五”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整个民族觉醒了,民族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战争之前,巴勒斯坦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拉伯国家来恢复他们的权利,而此后就依靠自己,并且明确表明他们的身份和政治斗争的目标,即构建独立的巴勒斯坦国。1968年,在民族主义组织主持下修改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对巴勒斯坦民族作出界定,指出“1947年前一直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人;1947年以后,不管出生在哪里,只要其父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也算巴勒斯坦人”,同时把“武装斗争”定位为解放巴勒斯坦的“惟一正确途径”。^[6]“六五”战争还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批抵抗组织纷纷成立。1969年2月,以法塔赫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组织掌握了巴解的领导权,阿拉法特任执委会主席,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一系列事实证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功绩卓越,它把巴勒斯坦人复兴的愿望变为行动,使他们有了依靠。它将这个民族从“濒临灭亡”的境地拯救出来,又促使巴勒斯坦人投入到一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并在世人面前把他们从需要帐篷的难民变为需要主权的民族。^[7]

在巴勒斯坦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巴以发生过多次冲突,其中1987年底在以色列所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的抗以运动,即“因地发打”运动(阿拉伯语“武装暴动”的意思)意义最为深远。该运动实际上标志着要把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从“约旦化”、“埃及化”和“以色列化”的巴勒斯坦人转变为真正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明确要求确认自己的民族特性,脱离以色列体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他们用石块对抗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勇气,给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

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尊严和自我认同感。可以说,“因地发打”运动不仅公开表示了对以色列的承认,^[8]也使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得到进一步认同。更重要的是,该运动促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抛弃了解放整个巴勒斯坦的主张,从而走上巴以和谈的道路。总之,巴勒斯坦民族是巴民族主义的根基,而同时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于民族的发育和成熟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萨义德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论述

一直以来,巴勒斯坦民族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处境:以色列经济实力雄厚,又有美国的长期支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经济困难,也没有正规军,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大多已与以色列和解,对以色列立场强硬的伊朗又离得太远,建国的目标遥不可及。1967年“六五”战争是萨义德政治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在那之前,我是循规蹈矩的学院人士,做的都是些规规矩矩的事——上大学,读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找到一份工作,获得助学金,写书——然后在1967年,我所知道的那个世界完全崩离析。以色列人占领了更多的巴勒斯坦,也就是巴勒斯坦的其他部分——西岸和加沙地带——而我突然发觉自己被扯回到那个地区。我从来没有教过中东文学——我虽教过一些英文翻译的阿拉伯著作,但基本上我的全部工作就是西方文学。因此,我开始要适应我的历史中那些多少被压抑或排斥的部分,也就是有关阿拉伯的部分。”^[9]的确,1967年的“六五”战争彻底改变了中东局面,萨义德也为此深深卷入到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和中东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从那以后,萨义德开始从单纯的文学创作转向政治行动主义。他开始了对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写作。萨义德用英文、阿拉伯文撰写的大量的专著、论文、报刊杂志的政治评论、新闻分析以及在世界各大媒体和阿拉伯媒体上发表的言论,严厉抨击了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中东政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场所,把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愿望昭示给国际社会。萨义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甚至将西方经典的文学作品纳入到对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当中。他指出:“文学研究的现代历史是在文化民族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文化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维护民族经典,然后去维系它的卓越、权威和美学特性。”^[10]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能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构建的手段。

萨义德无意成为形式主义或者唯美主义者,而现实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巴以的前景、故国的安危才是他

难以割舍的事情。巴勒斯坦在1988年的民族独立宣言中清楚地表示:我们进行的是世俗斗争,要把民主的权利赋予所有的人,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派。对萨义德来说,在其批评实践中最为切实的目标,就是恢复巴勒斯坦人返回并建设自己家园的权利。萨义德指出: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层次:一方面,它对人民来说是急需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中大多数今天根本没享有任何权利。比如在黎巴嫩有40多万巴勒斯坦人,他们全都以无国籍的方式存在,他们身上的文件写着“没有国籍”;另一方面,如果条件允许,巴人可以建立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拥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然而,由于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各式各样的滥用,人们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感受比较复杂。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斗争非常艰难,一是因为那是在宗教的民族主义非常强有力的环境中所进行的世俗的斗争,这不是一个宗教运动,而是一个要争取民主权利的民族主义运动;二是因为它在中东这个缺乏民主政治的环境下争取民主政治,其难度可想而知。^[11]

萨义德虽然力主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但他同时对民族主义感到不安:“民族主义很容易堕落成沙文主义。当你被各方攻击时,特别是在像巴勒斯坦人的运动中,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朋友,结果是跟自己同样的人相濡以沫,而所有那些非我族类的人,思想不跟你一样的人,就是敌人。对于生活在阿拉伯世界里的人更是如此。一般说来,民族主义运动的运作模式是这样的:它们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愈来愈小、愈来愈特殊和同质化。如南斯拉夫,那里从前是个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现在已经沦落到‘种族清洗’的地步。还有黎巴嫩,那里原先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有基督徒和穆斯林,后来却变成了每天不断地彼此屠杀,血流成河,而根据就是所谓的‘身份证’。如果有人要你出示身份证,一旦上面的名字或宗教不对,就会当场被杀。所有这些都表明,认同政治变成了分离主义的政治,然后人们就撤退到自己的小圈圈里。”^[12]这就是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具体体现,当然,这也是萨义德批判民族主义的最主要方面。

面对巴勒斯坦民族目前的处境,萨义德努力寻找解决的方法。萨义德指出,“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整个中东就是不会有和平。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考虑巴勒斯坦的历史事实和目前的现实局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原先就居住在那块以往被称为巴勒斯坦、但现在被称为以色列以及在1967

年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直以来,巴勒斯坦这个民族的人民被以色列的占领行为所驱逐。此后,他们不是变成了以色列境内的二等公民,就是遭到驱逐而成为遍布阿拉伯世界的难民和流亡者,再不然就是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下的人口。他们是没有国籍、没有栖身之所的人民,几乎在巴勒斯坦人存在的每一个国家,他们的情况都有别于当地具有国籍的人。即使在阿拉伯国家,他们也都被区隔出来。所以巴勒斯坦人强烈感受到只有成立自己的国家才能摆脱无家可归、流亡在外的残酷现实。他们需要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故乡或国家,让他们能和土地重新建立关系。”^[13]就地理位置而言,萨义德认为这块土地最应该安排在占领区里,因为那里是当今巴勒斯坦人最集中的地方。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依靠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各种民调都显示这一点:这个族群掌握了许多官方或非官方的资源。他们内部尽管还存在着分裂与歧见,但在所有人心目中,巴解组织毫无疑问就代表了巴勒斯坦人。”^[14]然而,西方世界和巴勒斯坦人本身对巴解组织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在西方世界内部,萨义德也感觉得到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就是在巴勒斯坦内部、阿拉伯世界、不结盟世界、伊斯兰世界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巴解组织的看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在西方、或者说应该在美国对巴解组织的看法——这和法国、英国的看法又很不一样。在美国,官方认为巴解组织是恐怖组织。然而那并不属实,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巴解组织,它都应定位于某个国际组织。也许我们不喜欢巴解组织,它的形象不好,它在媒体上给人的观感显然也不好。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组织。”^[15]

在巴以问题上,萨义德反对将恐怖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萨义德对极端民族主义所抱的态度是其不主张以暴力流血等极端方式反抗以色列态度的表现,因为极端方式不但无法真正寻求生存家园,而且恶化了巴勒斯坦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得不到道义的支持。^[16]当国际舆论指认哈马斯为恐怖组织时,萨义德为维护哈马斯的地位和名誉作出了许多努力,他指出:“哈马斯所做的工作90%都与恐怖主义无关,而是通过教育和类似的事、通过白天照护中心、通过供给食物,这些政府所不能或不会提供的东西,来制造经济机会。那是他们发展的方式。他们似乎在你经济不利、政治停滞时,当你身为公民却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性时,制造了机会。”^[17]

如果巴勒斯坦能够建国,中东地区就会有更大程度的和平以及更大程度的稳定。“现在正在戕害中东地区的,其实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挫折感,这也是宗教极端现象复苏的原因。但它并不完全局限于伊斯兰,而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的极端主义在整个地区蔓延。那里存在着一种无力感、停滞感。特别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在中东的阿拉伯社会中最擅长表达,而他们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不公,觉得自己的问题总是被强权左右,而且被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当然成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他的问题,如贫穷和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公和社会的畸形,都将会继续存在。但我认为,任何巴勒斯坦人都非常重视的是:必须让人觉得会有个解决办法,而且这个问题要有个公平的解决办法。”^[18]更何况,巴勒斯坦人有权表现他们自己,有权为自己说话,有资格叙述自己的历史,而且其历史具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性。^[19]虽然巴以两个民族在历史上存在着各种联系,但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媒体中,巴勒斯坦的声音并没有得到萨义德所说的“叙述许可”。即使得到了这种许可,也必须由以色列的对抗声音来平衡。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样的叙述无疑是不公平的。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萨义德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仍然充满信心:“我认为任何看起来似乎是冻结的、无法逆转的、不会改变的、对一切顽抗的情况,都有可能改变。这里存在着一个意愿:有许多方式可以用来进行各种不同的协商,当务之急就是尽可能去发现改变的意愿。不幸的是,现在权力的优势,军事和经济力量的优势都是在以色列人那一边,而以色列又受到美国几乎毫无限制的支持。在阿拉伯没有任何的阻力能让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处于失利的位置,所以在以色列只看得到学院式的辩论。我们中仅有少数勇敢的人在做许多极其重要的工作——政治上的组织,作证,协助缓解占领区的紧张局势。但大体上说来,以色列人的立场是麻木不仁的,而且大权在握。”^[20]

三、萨义德民族主义思想中的悖论及其原因

民族是历史性的建构,虽然不能否认它给予文化和种族现实的积极性,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认同,尤其是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观念,不能不考虑到它的局限性。萨义德指出,“尽管(民族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功效,但在知识和政治上,它也有着巨大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与民族身份的偶像化有关。民族身份

不仅成为偶像,也变成一种幻想。在我看来,随之而产生的的是我称之为的一种极端宗教情绪。这虽然并不是原教旨主义的一切,但确实是重要的构成。”^[21]由此,萨义德明确地反对民族主义,“我非常厌恶它(民族主义),它是我在知识上、道德上和政治上一贯反对的宗教幻象的第一个对象,尽管民族主义对于反帝斗争是必要的,但是它却变成一种反对民族本质和身份的武器。帝国主义的对立面当然就是民族主义的出现。民族主义是许多东西,显然,它的一方面是一种反动现象。它是对身份认同的声音,而身份认同问题在民族主义者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斗争的早期阶段掀起了文化与政治工作的整个浪潮。在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都能看到这一点。你也可以在阿拉伯世界的各个方面,当然还有加勒比地区看到这一点。”^[22]不可否认,由民族主义引发的分离主义逻辑以及宗教在其中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确实令人痛恨,所以面对民族、宗教和民族主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萨义德坚持对某种普遍价值的追求,即是否尊重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权原则”在内的人类普遍价值。因为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和准则,无国界民族之分。可见,判别民族主义的道德分界线就是坚守人道主义的道德底线,就不允许专制政权不顾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使用国家暴力肆意践踏人权。

由此可见,萨义德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充满矛盾,他一方面肯定了民族主义在反抗殖民压迫和非殖民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意识到它的负面作用,甚至用到“厌恶”等字眼。其实,萨义德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是清醒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实际上就摆脱了与民族主义的纠葛,相反,无论是萨义德理论的形成还是传播都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虽然在理论上明确反对民族主义,但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强烈真挚、挥之不去的中东情结和民族身份认同感注定了他的民族情感倾向。在涉足政治的初期,他的民族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他为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辩护,并坦诚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及“因地发打”运动。“六五”战争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第一次成为中东独立的力量,萨义德十分欣喜,觉得巴勒斯坦的未来从来没有这么有希望过。他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归属感,对他们的英雄主义感到骄傲,对他们的苦难和挫折感到痛苦,所有这些真实的感受都反映出:萨义德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又成功地维护了巴勒斯坦的民族利益;他反对民族主义,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然而在中东及其他地区更多激起的还是民族主义;他宣

称自己的立场是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却又始终如一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场上发言;他批判东方主义,认为它是欧美民族主义的变形,然而它浓郁真挚的民族情感却使之难以摆脱民族主义的束缚。萨义德虽然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但并不主张取消民族主义,而是主张多元文化主义,也就是多民族主义的共存共荣抑或宽容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允许自己的民族主义存在,但也允许其他民族主义存在,并试图在各种民族之间建立起对话机制,逐步超越民族主义而达到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状态,从而避免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23]我们在对萨义德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认识到他本人的矛盾之处,特别是其狭隘的民族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及其对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存在的不足。

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有其深刻的心理背景,对萨义德来说,中东情结和西方话语的矛盾始终伴随着他的学术活动和政治生涯。一方面,中东情结的产生与其身世阅历关系很大:“我这一研究的个人情结大部分源于小时候在两个英国殖民地所获得的‘东方人’意识。我从没忘记我亲身经历过的作为‘东方人’的文化现实。”^[24]萨义德认为:“伊斯兰是所有阿拉伯人共享的东西,是我们身份认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5]由此,萨义德的中东情结包含了深沉浓厚的阿拉伯东方人意识、情感和观念及其驱使下的以中东为议题的心理倾向和思维定势,是其积淀深厚的伊斯兰精神。它虽然不表明萨义德一定具有代中东阿拉伯人立言的立场,但充分体现出个人对祖国的天然向心力,是其灵魂的渴求。每当发生与之有关的重大事件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关切。正因为如此,萨义德的论述便总是与中东问题有联系。另一方面,西方话语指萨义德接受的西方文化、宗教、语言以及表达方式的教育浸染。于是,西方人意识作为第一自我,中东情结作为第二自我,交互主导。中东情结与西方话语的双重真实性在萨义德的不同人生阶段,或者同一阶段的不同侧面交替占主导作用,从而形成萨义德不同的学术成果、社会行为以及心理感受。他横跨不同文化而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不同的人格侧面令他彷徨不安,边缘孤立,于是形成高傲不屈的性格。

四、结语

毋庸置疑,巴以问题是复杂的,各种因素(历史的、现实的、宗教的、民族的、地理的)纠缠交错,仅有善良

的愿望与祝福是不够的,改变现状不但需要民意的基础、国际社会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双方领导人的理智、勇气与魄力。尽管萨义德无数次重申,对以色列平民的杀戮没有任何道德基础,并力劝巴勒斯坦人正确对待以色列人所遭受的历史劫难,但还是被反对者贴上“恐怖教授”的标签。他始终都在批判阿拉伯世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并称之为“震耳欲聋的沉默”。萨义德曾经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两国论”的,但在《奥斯陆协议》之后,特别是在以色列定居点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他感到原来的构想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从新南非的经验获得启发,转而重提“一国两族”(a bi-national state),即“一个国家,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世俗的民主制度下平等共存的思路。“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26]虽然2003年距离以色列国建立已经55年,但这位弥留的老人依然无法看清天空的所在,无法找到鸟儿应当飞翔的方向。他念念不忘的也许并不是自己在文学评论领域所贡献的东方主义理论,而是那个远在千里之外却无缘返回的故土巴勒斯坦。

峰回路转,2009年6月,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对中东国家进行访问,他在开罗的讲话为人们勾勒出美国大中东布局,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奥巴马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表态。在他看来,巴勒斯坦人民的境况是不能容忍的,而美国对巴勒斯坦人追求尊严、机会和自身国家的合理抱负也不会置之不理。尽管对巴勒斯坦尤其是哈马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希望,但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避免给世人留下偏袒以色列的印象。如果美国经济能够触底反弹,奥巴马将很有可能在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让我们以这个喜讯告慰萨义德的在天之灵,因为他一生卓越的知识实践与政治实践与当代最敏感、最激烈的冲突纷争相牵连。他凭借着一种处于恐怖、压迫的环境下奋起抗争的精神,为解放巴勒斯坦而呕心沥血。这种精神包含着知识、毅力、勇气、敏锐和正直,无论失败与否,都让人肃然起敬。

[注释]

[1] Franz Kafka,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Schocken, 1988, p. 67.

- [2] Anthony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Routledge, 1998, p. 126.
- [3] [美] 约翰·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M], 宋伟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79页。
- [4] 杨辉、马学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起源及早期实践》[J], 《西亚非洲》2002年第2期, 第44页。
- [5] Nadim N. Rouhana, *Palestinian Citizens in an Ethnic Jewish Stat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67.
- [6] 杨辉:《试论巴勒斯坦民族构建问题——本土与流亡民族主义的磨合与分歧》[J], 《西亚非洲》2006年第9期。
- [7] 赵克仁:《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历程》[J], 《世界民族》2007年第1期, 第22页。
- [8] Bex Brynen, *Echoes of the Intifada, Reg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1991, p. 68.
- [9]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三联书店, 2003年版, 第449页。
- [10] Edward W. Said, *Sharpening the Axe*, Al-Ahram Weekly Online, 2001-07-05.
- [11] Edward W. Said, *The Arabs Today: Alternatives for Tomorrow*, Forum Associates, Columbus, Ohio, 1973.
- [12] [14] [15] [18] 薇思瓦纳珊编:《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M], 单德兴译, 三联书店, 2006年版, 第261页, 第321页, 第416页, 第367页。
- [13] Edward W. Said, *Peace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Palestinian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Vintage, 1996, p. 213.
- [16] Edward W. Said, “A New Current in Palestine”, *The Nation*, 4 February 2002.
- [17] Edward W. Said, “A Desolation, and They Called it Peace”, *Al-Ahram Weekly*, 25 June July, 1998.
- [19] 爱德华·萨义德:《写作与祖国》[J], 《意见》(阿拉伯文) 1999年第1期。
- [20] Edward W. Said, “Permission to Narrat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Spring 1984.
- [21] [22] [24] [25] Edward W. Said, *Blaming the Victim: Spurious Scholarship and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London: Verso, 2001, p. 76, p. 174, p. 176, p. 182.
- [23] 王富:《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赛义德现象》[J], 《科技经济市场》2006年第7期, 第226页。
- [26] 爱德华·萨义德:《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M], 金玥珏译, 新星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3页。

作者简介: 李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上海, 200083)

收稿日期: 2009-06-19

修改日期: 2009-08-24

system lies in human beings. Human needs indicate and explain human deeds; likewise, need-altering of states can be used to interpret foreign policies of states. Approaching from a microscopic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i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strue the foreign policy making with the theory of needs hierarchy and scrutinize whether this theory of needs hierarchy devised by Abraham Maslow is applicable on the state level and how the needs influence “corporate man”, or “state” .

57 Multilateralism: In Light of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Model”

by Zhao Zongfeng

Multilateralism is the interactive form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dopt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ore than three countries for the purpose of cooper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certain goals. Although institution constitutes to certain degree the core of multilateralism, it is not its only logic. There are varied properties embraced in the concept of multilateralism and studie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are called for. In light of the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model”, three layers of logic are revealed: multilateralism as means, multilateralism as institu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as value. In other words, multilateralism is the unity of means, institution and value.

Countries and Regions

63 The Transformation of PSD in Romania and Its Future Prospect

by Huo Shuhong

Roma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PSD) is the party which evolved gradu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Salvation Front. As 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y, PSD shows distinctive features: Although the party claims that it is Romanian communist successor, it does not inherit the latter's organizational system; It moves slowly politically in the transformation into a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t has held the balance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dramatical transformation of Romania politics and no other party can take its plac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PSD are the result of the working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68 Said's Thoughts and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by Li Yi

Edward Said came forward and plunged into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struggle in a specified period of history when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Middle East were submerged. Said's understanding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is filled with contradictions. He was unequivocally opposed to nationalism in theory, but in practical political activities, his strong and sincere feeling for the Middle East and his national identity determine the trend of his national emotions. After studying Said's thoughts in the context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this paper will tap deeply into Said's sense of national crisis as well as the content of the struggle to arouse the people so as to inspire greater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peace-loving people to support the Palestinian cause of liberation.

74 Internet Diplomacy: A New Weap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Diplomacy

by Tan Youzhi

Internet diplomacy has developed into a new weap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U. S. government makes efforts to use internet diplomacy to influence and guide the public in foreign countries, improve its diplomatic soft power while achieving its diplomatic hard goals, and to enhance U. S. national interests by means of demonstrating its “smart power”. However, unless the U. S. government seriously rethinks and completely abandons its hegemonism and unilateralism, internet diplomacy will not be able to bring into full play its ability for robust public diplomacy.